

以社会协调发展 促进西部地区

陆学艺
樊平

现代化

编者按：区域发展的差距，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目前，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实力和人均 GDP 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社会的协调发展，以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陆学艺先生和副研究员樊平合著的这篇文章，针对我国西部地区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位和自身特点，提出了西部地区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这就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加强政府对环境资源、公共产品和法律秩序的监管作用；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和信息产业；将就业和人均收入增长放在重要地位；加快资源存量优势向资源市场优势的转变等等。陆先生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深入到资本经营和生产要素重组层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与能力加强，区域竞争力与效率、效益、收入增长的关系也更为明显，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区域间经济结构的差距的本质原因不仅存在于经济结构内部，还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1996 年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实行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以调节分配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对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十分必要。目前由于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地区性问题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但是在全局紧迫性的位序相对后移，国家对西部地区投入不可能有大的增长，西部地区现代化战略需要审时度势，突出区位优势。在不放弃国家支持力量的机会前提下，工作重点转变到挖掘内部发展潜力，集中在发现市场和寻找新的增长点。在追求地区经济实力和人均 GDP 的目标的同时需要注意西部地区的社会协调发展，以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现代化。

一、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压力和问题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有两个直接的显著标志，一是人均 GDP 水平较低；二是总体上属于重工原料型粗放经济，工业化程度低，缺乏产业延伸，初级产品外出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大，对于资源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较严重；三是经济发展环境差，不仅表现在经济组织内部，而且表现在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素质较低，缺乏激励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反映出经济总量不足与经济质量脆弱并存。经济发展低水平和产业结构低度化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城乡内部结构、城乡关系和政府能力（不仅是财政能力）都有显著影响。

地区差距的扩大是由生产的差距来决定的，生产的地区差距比收入的差距更大。1979 年至 1995 年各地区 GDP 增长速度排序，全国为 9.89，沿海地区为 11.29，中部地区为 9.27，西部地区为 9.03。以人均 GDP 为例，在 1994 年上海为 15204 元，贵州为 1553 元，相差 9.8 倍。广东省为贵州的 7.7 倍，和 1991 年 3.3 倍相比扩大速度很快。不同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及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的进一步强化，地区间差距扩大的循环性特点就更为显

著。发达地区不仅收入高、增长快，决定进一步发展的投入增长及结构调整速度也快；落后地区的情况相反，增长慢、收入低、投入少、效益差。竞争环境条件及竞争能力的巨大差异造成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

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地域和群体特征。贫困者则多集中于中、西部欠发达及落后地区。1994 年后西部地区的贫困由农村贫困又加上了城市贫困。1993 年按省份统计的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广东，人均 4275 元）与最低收入（内蒙古，人均 1710 元）之比已达 2.50:1，而 1987 年和 1991 年的该比例数字分别为 1.72:1 和 2.15:1。1994 年，不同地区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又在继续扩大。东、中、西部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为 1.41:0.95:1，比 1985 年的 1.15:0.88:1 扩大了 0.26 和 0.07 倍。考虑到不同省份内部也存在有较大差距，在贫困程度深的地区扶贫将更艰巨。

现在城市职工下岗和再就业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经济效益不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在职职工家庭和退休职工家庭成员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原属低收入户或中等偏低收入户的减收比重更大。1995 年按行业工会调查统计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生活费标准的困难职工已经达到 1000 万人，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的 8%，只能勉强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但是规模分布并不均衡。一是企业亏损面的地区差异：据 1995 年 5 月的汇总统计，广东困难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1.6%，困难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2.68%；辽宁的相应比例是 6.5% 和 8.5%；甘肃的相应比例是 19.43% 和 14.92%。二是各地根据当地标准包括在业贫困者群体规模以及占当地城镇居民总人口的比例也不相同：在发达地区，上海市 1994 年已经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线调整为职工人均月生活收入 180 元，职工家属 135 元，低于这个标准的职工占全市职工总数的 1.9%；在欠发达地区，云南省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低于 90 元的职工占当地职工总数的 6%，内蒙古月人均收入在 70 元以下的职工占当地职工总数的 8%。虽然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但是整体上西部地区由城镇贫困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的社会影响更大。

农村的低收入者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农民。1998 年仍有 5600 万左右的农村居民温饱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构成了西部地区低收入层的主体。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别逐渐扩大，如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

199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排序中,上海以2726.98元高居榜首,居二、三位的北京、浙江与上海的差距就达850元至1000元,收入水平最低的甘肃只有550.83元,仅及上海的五分之一。1993年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3.2%,收入水平达此平均线以上的只有11个省份。另据测算,1993年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之比由1992年的1:0.69:0.66扩大至1:0.66:0.54。反映收入差距的农户间基尼系数由1992年的0.3135扩大至1993年的0.3304。综合年度内有关调查资料,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继续。1994年,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为1.71:1.10:1。

全国农村村级组织集体经济水平也相差很大。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已经普遍达到3500元以上,贫困落后地区农民收入仅为300元。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结构也有所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农民收入的80%来源于非农产业,农民劳动时间的90%从事非农产业,而且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收入往往高于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原因在于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是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化经营。1993年年底,全国每个村委会拥有的资金为人均146.91元。扣除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均占有额多的因素,中西部地区的“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空壳”的比重就占绝大多数,这些“空壳村”实际已经丧失了进行行政社会管理的能力,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由此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农村和城市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区域正是农业比重最高的地区。1992年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带,农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7.2%、46.7%和55.3%。农业增产不增收也拉大了地区差距,并且动摇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

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不仅直接影响着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现行财政体制对非生产部门社会成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以1993年底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实施工资改革为例,由于财政困难等因素,全国约有50%的地区未能兑现新工资制度,相反,在不少发达地区却认为新工资制度的增长幅度太低。

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形成的收入差距与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90年代初期,新疆通过正常手续外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就达6500人,宁夏达5000人。这种状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任其持续下去,地区之间的利益差距就容易和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从而产生各种不稳定因素。当地劳动力素质下降又会导致进一步破坏和污染环境。

二、区域现代化的社会协调发展目标

社会现代化是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社会现代化过程需要长期的准备和积累。社会现代化还是一种协调发展的过程,不是社会体系某一个因素单独发展,而是包括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和价值观念的改变。UNDP《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概念的表述并非仅仅是收入,也包括生产率、公正、持续性和权能授予;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对个体代理商或部门的投资,在国家发展中要特别注意政治资源的使用能力。”任何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过程,都是普遍的特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西部地区由于自身所处的经济区位、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1. 持续迅速的经济增长,首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渐超过工业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 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重大改变。3. 政治民主化和普遍参与。4. 社会结构日趋分化和专门化。各种社会活动日益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专门化的功能互补性社会组织迅速发展。5.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不发达地区和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主要的制约因素在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由落后的、愚昧的生活方式转变到文明的、科学的生活方式,由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价值观念,转变到积极向上进取的精神状态。6. 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类居住方式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的综合反映。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的水平同现代化水平成正比。

中国正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其基本特征是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同质的单一型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转型社会时期的社会在主导方面开始向现代化转化,但转化不平衡、不系统,存在着差距与矛盾。各种新与旧的混合是转型社会的突出性质。转型社会时期一个基本特征是异质性,即各种差别很大的行为、观念、规范、制度同时并存,新身份与旧角色并存。第二个特点即形式化。即规则、法令、条文失去实际控制功能,原则界限不清并可能相互矛盾,组织运行的效率降低。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含义是,社会各个系统之间(包括社会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交换)以及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内。

社会协调发展概括讲,主要包括在五个方面:即经济非农化、人口城市化、社会活动民主化和规范化、生活方式和人口素质现代化。

三、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领域

结合上述标准和中国西部地区在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位和自身特点,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领域可以考虑: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转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念,在经济发展中注重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需要条件来确定资源和环境保护战略。丰富的资源如果不与市场相结合对于西部地区发展就不具有意义;但是如果放任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则会以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实现资源的综合和持续利用,不断改善环境质量,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带动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建立新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指导思想,关键是要在区域发展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向和使用规则上体现出来,并且能够用科学的区域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来检测各因素的贡献份额、发展阶段和趋势。

加强政府对于环境资源公共产品和法律秩序的监管作用,在政府人员裁减和机构调整的背景下强调此尤其重要。市场经济个人理性的效益优先选择不可能将公共产品放在首位,因此要加强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守护人的管理能力,通过法规和舆论教育群众,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政府行为要防

止地方保护主义。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传统行政意义上理解的地理经济概念并不是由地形地理区域决定的,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为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违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地方保护主义会在动态转移中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地位,从而限制自己的竞争能力和潜在发展机会。现代化进程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其发展动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区域政府领导人是否认识到了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外界市场、参与区域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日渐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国情区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避免成为发达地区的“依附性外围”。在区域发展决策中积极鼓励群众参与,通过广泛讨论形成规则,这样才能使群众将自己的行动与区域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形成共识,才能保护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这样就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方面形成一个价值与行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整体,使可持续发展由价值合理的道德标准转化为具有整合能力的“利他——自利”型行动准则。

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和信息产业。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水平升级和社会事业管理的效益,提高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贡献率。以适应科技带动地方经济和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并对经济增长的轨迹和趋势产生重要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要从资源出口型经济转变为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技为主的知识生产、分配、创新和使用为重要要素的经济。联合国教科组织目前调查报告指出,最近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以色列国是国土面积不足2.8万平方公里,条件极其恶劣,资金贫乏,人口仅560多万的小国。1997年电子业总销售额达72亿美元,电子业出口为57亿美元。其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占有知识方面拥有很大优势。该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居世界之首,平均每1900个劳动力就有77名大学生,每1万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个数字大大高于美国80人和日本75人。合肥市居于内陆,缺乏突出的优势,却硬是造出“美菱”、“荣事达”等全国知名的大型企业。究其原因还是合肥市人口素质在全国名列前茅,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数比例为全国第二,加上背靠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其发展经济的实力自然不容小看。由此可见,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主要占有厂房、设备和劳动力转化为着重追求占有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这种趋势将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而不断增加。

将就业和人均收入增长放在重要地位。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又是社会稳定的指示器。就业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家庭化方式向相对专业集中型方式转变,公有制经济单位的潜在剩余劳动力加快向社会分离,“就业市场化、失业公开化”制度加快建立,劳动就业从数量型向效率型的模式转换,西部地区的劳动就业面临巨大压力。在制度安排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继续大力促进集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保持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稳步扩大就业机会。(2)配合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劳务市场,打破区域封锁,促进横向联系,实现地区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3)积极创造条件,稳步扩大对外劳务出口。(4)提高个人素质和竞争的主动性,

迎接就业竞争的挑战。在现代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已经由先赋主导转为自致主导,个人的积极选择在决定自己的发展质量中起越来越重要作用。社会竞争需要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也依赖于创造的国民财富。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看,工资按时足额发出必须由企业负责,社会保障必须由政府负责,而择业竞争能力和抚养家庭能力则必须由员工个人负责。

变资源存量优势为资源市场优势,在注意发展结合西部地区资源的有效市场需求的高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能够发挥比较成本优势。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也包括原有的和近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源。现有企业结构调整和职工下岗是全国性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会因需要首先解决本地职工下岗问题而采取相应的地方保护性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会有所减少,由此形成的一个新的机会是:西部地区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几年来外出打工者积累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他们回乡创业投资,在西部地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样就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外地和当地的市场优势通过企业创新者结合起来,通过企业管理和以销定产,能够占领当地的一部分市场,也能带动一批科技型农业和工业示范项目。在传统农业地区,以打工仔返乡和已经毕业的农村大学生回乡为代表,一批有资金、懂技术、眼界开放、有市场经济头脑的新型农民创办的生态农业、两高一优农业和小型企业已经形成规模收益,对当地农民形成生动的邻里示范并且产生了强烈震撼。这批新型农民以敏锐的市场眼光、先进的实用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在农村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中形成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农村的职业分化和组织分化中成为重要的技术引导力量和社会整合力量。这一思路对于城市职工下岗就业也同样可以适用。

鼓励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人们总是力求从低社会地位向高社会地位、从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从发展机会较少的欠发达地区向发展机会较多的经济发达的地区转移,这种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层次和空间的位移就形成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社会流动受到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制约,又在重新构造着新的社会结构和资源使用规则。在现代化社会中,决定地位和身份的因素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由先赋身份转向成就身份,个人经过自身的努力、活动可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结构体系变动也对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变化产生影响,正是社会成员的流动,改变着社会结构,造成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变迁。

城乡一体化发展。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多,市区人口比重低。在缺乏大的中心城市带动条件下,要利用已有基础,有规划地逐步发展一些作为地方经济和市场中心的中心城市,建立城市、小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有机联系,带动区域发展,这样的城市建设发展评价指标不会很高,但对于周边地区的带动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攀枝花、六盘水等。城、镇、乡关系要体现出经济和社会内在关联:第一,社区要素相互交流。城镇乡村社区的共同进步的协调发展。第二,社会结构相互渗透。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口职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都以小城镇为中介相互联结、相互渗透,构成统一体。第三,社会功能相互补充。第四,社区效益相互制约。第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再现了向郊区和乡村扩展的趋势,农村则出现了城镇化、现代化的趋势。在跨区域竞争中,西部地区开拓外部市场能力较弱,城乡一体化有助于开拓内部市场,增强区域实力和协调程度。